

罗国杰文集

第六卷

罗国杰生平自述

中国人大出版社

罗国杰文集

第六卷

罗国杰生平自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国杰文集/罗国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300-22196-0

I. ①罗… II. ①罗… III. ①伦理学-文集②道德建设-文集③杂文集-中国-当代
④罗国杰-自传 IV. ①B82-53②I267. 1③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2006 号

罗国杰文集

Luoguojie Wen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73 插页 19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 616 000		定 价 598.00 元 (全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2008年，我已达80高龄，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真是去日苦多，悔已无益。念及半个世纪以来为新中国伦理学发展所作的不懈追求，思虑万千，深感遗憾，总觉努力不够，成效极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一些值得回忆的情节，对一些愿意了解这些情节的人，可能多少还有一些参考价值。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撰写一本自传性的《罗国杰生平自述》，把自己平凡一生的所作所为记载下来，以备对过去的行为和思想进行反思和省查。当时，随心所想，信手写来，可长就长，想短就短，有简有繁，无一定格，在几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共写成9万多字的书稿。从2010年2月底开始，几次大病之后，身体情况稍有好转，我决定集中精力和时间把这一《罗国杰生平自述》写完。前后用了3个多月，把原来只有9万多字的书稿增加到32万字，基本上完成了《罗国杰生平自述》初稿的撰写。

目 录

一、学生时代和在上海工作的七年	1
(一) 我的家乡	1
(二) 我的家庭	2
(三) 小学阶段——内乡县杨集镇高级小学	3
(四) 中学阶段——河南省开封初级中学和开封高级中学	6
(五) 进入同济大学.....	12
(六) 沈崇事件对我的影响.....	15
(七) 参加“一·二九”运动.....	16
(八) 加入上海地下党组织.....	18
(九) 国民党政府的大逮捕.....	22
(十) 迎接解放.....	26
(十一) 担任中共同济大学党总支书记.....	28
(十二) 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学习.....	30
(十三) 到虹口区委宣传部工作.....	31
(十四) 参与镇压反革命运动.....	33
(十五) 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34
(十六)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	36
(十七) 从虹口区委到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37
二、初到中国大学的十年	43
(一) 走进中国大学.....	43

(二)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	44
(三) 留校任教	49
(四) 初建伦理学教研室时的教学与研究	50
(五) 1962 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简编本的编写	52
(六)《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的编写	53
(七) 参加周扬主持的关于人道主义的编写组	56
(八) 中苏大论战及其以后的理论战线	57
(九) 卷入一场大批判的风暴	58
(十) 周扬及其代理人给我拟定的错误	62
(十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的任命及被撤销的经过	64
(十二) 深入基层锻炼和接受教育	65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68
(一)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大革命’前夕	68
(二)《五一六通知》和红卫兵的兴起	70
(三) 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及其两大派别	72
(四) 携妻带子一百天‘大逃难’	75
(五) 被批斗	77
(六) 遭受突然袭击	79
(七)‘大批判’的年代究竟能做些什么?	80
(八) 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82
(九) 干校第一次劳动考验和神奇的针灸疗效	84
(十) 住进‘水晶宫’中打红石	87
(十一)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陈秋梅的自杀	89
(十二) 回到北京参与编撰《新华词典》	91
(十三) 成为‘洪广思’的一员	92
(十四) 为地下党员杨峻岳平反的电报	94
(十五) 对我的审查结论的纠正和补充	96
四、学术研究的春天	99
(一) 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	99
(二) 全国伦理学会的成立	101

(三) 开办全国性伦理学学习班	102
(四) 从讲师到博士生导师	104
(五) 一系列伦理学专业著作的编写和出版	106
(六) 对当时道德问题的认识	111
(七) 新形势、新情况和《伦理学》一书的出版	116
(八) 开展科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伦理学基地的建立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117
(九) 担任哲学系系主任工作的一段回忆	118
(十) 1985 年开始的副校长工作	126
(十一) 陪同袁宝华校长访问莱比锡大学	129
五、对外交往与两岸学术交流	133
(一) 访问苏联的一些情况	133
(二) 组织翻译《西方伦理学简史》	143
(三) 参加日本“阳光文明国际会议”	145
(四) 参加韩国“孝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	151
(五) 同苏联伦理学教授季塔连科的交往	154
(六) 邀请斯卡尔任斯卡娅来中国访问	158
(七) 对台湾的学术访问	162
(八) 招收伦理学第一个外国博士生	177
六、从学术研究到建言献策	179
(一) 两部教材和两部大型工具书	179
(二) 《中国传统道德》的编写	184
(三) 《中国革命道德》的编写	187
(四) 在中南海讲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政治统治”	188
(五) 在中宣部会议上对几个重要提法的建议	195
(六) 在中南海向中央提出坚持集体主义的重要性	197
(七) 担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5 年的一些体会	201
(八) 《道德建设论》获“五个一工程奖”	204
七、人生七十古来稀	206
(一) 70 岁老人还能否掌握计算机的运用?	206

(二) 第二次赴台访问	207
(三) 第二届海峡两岸伦理学学术讨论会	213
(四) 第一届中英学术讨论会（北京）	215
(五) 第二届中英学术讨论会（伦敦）	216
(六) 我的几部著作	220
(七) 参与编写“马工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29
(八) 评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并被授予“金牌”	233
(九) 第二部《罗国杰自选集》	235
(十) 完成特别委托项目“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236
(十一)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个人小结	242
(十二) 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中国伦理思想史”	245
(十三) 担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53
(十四) 对伦理学的教学、研究和探索历程的回顾	254
(十五) 我的伦理思想的初步概括	257
八、业余爱好和晚年感想	268
(一) 离休后的考虑	268
(二) 我对专业书籍的收藏及其感想	271
(三) 我的书法和对砚台的收藏	277
(四) 晚年同疾病的斗争	279
(五) 我的人生理想和追求	286
九、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93
(一) 我的态度	293
(二) 2010年后我的工作计划	295
(三) 尚未完成和需要出版、修订的书稿	302
后记	309

一、学生时代和在上海工作的七年

(一) 我的家乡

1928年1月3日，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专区内乡县的罗岗村。这一天，是农历丁卯年的腊月十一日，从属相来说，我是属兔的。

南阳处于中国南北的分界线上，历史悠久、物产丰富。南阳地貌状如大碗，因称宛，位处河南省西南部，北连汝洛，南襟荆襄，西通武关，东连江淮，自古为四方交通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阳以南为南方，以北为北方。世人习惯性地称南阳以南为长江水系，以北为黄河水系，以东为淮河水系。南阳处于几面环山的盆地，常年风调雨顺，不像北方那么冷，也没有南方那么热；在一般情况下，既没有洪涝灾害，也不会缺水干旱，是中原一个适宜居住的地区。

当年，《诗经》描绘过这里的楚地风雅，李白吟咏过这里的汉时繁华，“清歌遏流云，艳舞有余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这一切，无不彰显出南阳作为楚汉文化的发祥地，具有无可替代的标志意义。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南召（南阳所属的一个县）猿人就生活于此。春秋战国时，这里是全国著名的冶铁中心，是全国八大都会之一。秦始皇统一天下，分全国为36郡，南阳郡为其一。西汉时，南阳由于水陆交通发达，农业发达，成为南船北马、生意兴隆的全国五大都市之一。西汉末年，刘秀起兵南阳，夺取天下，建立东汉，其28位大将多来自南阳，定都洛阳，南阳为陪都，因在洛阳之南，有“南都”、“帝乡”之称。作为帝乡的南阳成为当时全国第二大城市，郡城周长36里，其规模比

1990 年的南阳还大。唐宋以后，南阳才逐渐衰落。李白曾在南阳留下了很多诗篇，如“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

南阳自古人才辈出，先秦楚国名相百里奚，吴国名相范蠡，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汉光武帝刘秀，蜀国大将黄忠、魏延、邓艾等，唐朝诗人岑参，哲学家冯友兰，军事家彭雪枫，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著名作家姚雪垠，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等都出自南阳。

我出生的内乡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专区，是八百里伏牛山的门户，扼秦楚交通之要塞。内乡县的县域，在春秋时为楚国所属，秦时始置郦县，内乡县的县名始于隋初。内乡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当前，它有着全国著名的“一山、一衙”。“一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天曼”，它被誉为“天然物种宝库”，不仅有 2900 多种珍稀濒危植物和华南虎、金钱豹、金雕等许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而且它的自然景观也堪称鬼斧神工，雄奇瑰丽。内乡县的大部地区为伏牛山的大小山脉所覆盖，只有东南部的地势比较平坦，但也只是一些高高低低的小丘陵，我出生的罗岗村就处于有着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内乡县。“一衙”就是目前被称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历史标本的“内乡县衙”，它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级衙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我的家庭

我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父亲叫罗凤鸣，字介福，他曾经到开封读书，大约是职业专科一类的学校，之后就回到家中闲居。再之后，曾到我家所在的杨集镇的镇政府任师爷，大体相当于文书、秘书之类的职务。后来，又跟随一个地方民团的团长吴定远，仍是负责文书、秘书之类的工作。1940 年以后，因为在政界没有更多的发展前途，就从事经商，主要是开设油行，但也没有赚到什么钱，相反，总是亏本，直到他 1948 年死去，是年 44 岁。父亲在我家的大门上，按照他的名字（罗介福）刻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介一不取真君子”，下联是“福五临门大丈夫”，反映了一个商人既想赚钱又想得到好名声的心理。由于经商赚不到钱，我家的经济收入主要还是靠地租。全家共有山坡土地约 120 亩，按当地的情况，可以说是中等地主，年收租小麦 20 担

左右（每担约 400 斤）。我能读书，和家庭比较好的经济条件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没有地租的收入，家中就不可能有供我上中学和大学的费用。

据说在我祖父以前，我家是相当穷苦的，整个家庭以务农为业，家中生计是十分艰难的。我的曾祖父曾经到一个商店当雇工，作为一个雇工，他诚实勤劳，认真负责，因此得到了雇主的赏识。这个雇主没有儿子，死后将其大部分财产给了我的曾祖父，因此，我的家庭从此富裕了起来。我的祖父因有了大量的家产，成了我县著名的卢翰林的女婿。我清楚地记得，大约在高中时期，我在卢翰林家住过大半年，还看到卢翰林家中的清代穿戴的衣服和靴子，看到整柜子的供印刷用的模板，上面刻满了文章。当时，卢翰林早已死去，只有他的弟媳（我叫舅奶）和几个儿子还活着。

我的母亲叫彭德修，家住在离罗岗村只有约 10 里的彭岗村（属镇平县）。外祖父彭品三，曾任镇平县卢医庙镇的镇长，应属地主家庭，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势力。母亲受中国传统道德的影响较深，为人正直，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妇女，她总是教人宽容待人，体恤别人，体谅别人的困难，并尽力帮助别人。和邻居、乡亲、族人的相处中，她所奉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替别人着想，要让别人过得去”。因此，在大家分东西的时候，自己总是少分一点；在有失误的地方，自己总要多承担一些责任；在事情成功的时候，要多看到别人的功劳。她的这些品质，或者说她的这些为人之道，对我长大后的性格和品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令人惋惜和遗憾的是，我常年离开家乡从事革命工作，再加上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我未能给予我的母亲应有的关怀。从这一点说，我虽然忠于我的事业和信念，但却未能尽到作为儿子应尽的责任。

（三）小学阶段——内乡县杨集镇高级小学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928—1940），正是我国军阀混战的动乱时代。当时的内乡县（包括整个豫西地区）有一些由豪强和地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势力集团，这些集团控制着大大小小的地盘。在农村，更是兵荒马乱、

民不聊生、盗匪横行、社会动荡。为了安全，大约在我5岁的时候，我们家就搬到离罗岗村10多里的小镇杨集镇居住，因为那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我是在“杨集镇高级小学”读小学的。这个新式小学的校长叫杨定宇，他是一个曾经到省会开封读书的青年，课程是全新的，男女兼收。我只有5岁的时候就跟随姐姐进了这所学校开始读一年级，是当时一年级最小的学生。

在小学期间，前四年我只知道到处玩耍，不知道用功读书。最喜爱的是捉蝈蝈和斗蟋蟀。在炎热的夏天，我总喜欢到家乡的一些山沟里和草丛间去捉蝈蝈，尽管满山的藤条密密缠绕，再加上杂草和灌木丛林，并且有酸枣树的刺经常刺伤人的皮肤，但我还是毫无畏惧地在其中奔走，以能够捉到更多的蝈蝈而快乐，并由此练就了一手捉蝈蝈的好技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偕同妻子静贤和儿子罗毅到香山的树林中捉蝈蝈时，仍然能以熟练的技巧编织蝈蝈笼子，并把捉到的蝈蝈装进笼子，乐此不疲。

到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又迷上了捉蟋蟀和斗蟋蟀的玩耍。首先是要学会捉蟋蟀，往往在晚饭后，带着手电，顺着蟋蟀鸣叫的方向，轻轻地走近蟋蟀，看准了蟋蟀藏身的地方，迅速出手，将蟋蟀捉住。为此，要准备许多大小不同的罐子，里面放上蟋蟀喜欢吃的食。我还挑选勇敢的蟋蟀，让它们相互斗争。如果迷上了这种事情，就很难在功课上下功夫了。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虽然认识的字还不多，但已经开始大量阅读武侠小说。当时所能看到的就是《彭公案》、《施公案》、《包公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在大量阅读武侠小说之后，我又迷上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中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哥们儿义气”和“扶困济危”的思想，对我小小的心灵有一定的熏陶。我长大以后，经常是见到不平的事，就要出来干涉、劝解和调停。1989年年初，在蓟门桥商场内，两人相争，一人拿着尖刀刺向对方，当时，旁边的人都在围观，而我却冒着危险上前将两人隔开，最终使他们平静下来。过后，周围的一些人就好意劝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前去劝解，对自己实在太危险。但是，在以

后一些相同的情形，我仍然按照我的处事原则，对这种现象加以劝解和调停。

在小学四年级的期末，一件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我因为贪图玩耍和迷于武侠小说，几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学校给了留级的处分。在当时，“留级”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只有成绩极差的学生，才被给予留级处分。儿子留级，家长也因此没面子，父母为此十分生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父母对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我们姐弟三人，我是唯一的男孩，所以最受宠爱，一切吃的、穿的和用的，都是优先照顾的，但是，自从受到了留级处分后，我不但失去了原先所有的优先照顾，而且经常受到父母的冷落和批评。

父母对我教育的核心和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我通过读书、升学、从政而替父母争光，以达到所谓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目的。而我的留级给父母带来的确实是极大的失望。在整个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从早到晚、日日夜夜连续不断地劝导、批评、怨恨和斥责，在我的脑海中注入了一个极为深刻的观念，这就是只有把书读好，只有在学校的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才能得到父母的欢喜，才能保持自己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才能满足父母的心愿。

这次留级，一方面在精神上给了我一个极大的刺激；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一个极大的鞭策。一个原来只知道玩耍的小孩，从家长的对待中认识到功课不好和留级所受到的待遇。从此，我领悟到学习的重要，体会到成绩不好所必然受到的惩罚。这可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转折”，这个大的转折使我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从此开始，我决心放弃对蝈蝈和蟋蟀的迷恋，专心于功课的复习。

一个人在一生中难免要经受这样那样的挫折，这些挫折可以使人由此一蹶不振，灰心丧气，也可以使人由此振作起来，痛改前非。这中间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要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由于留级所受的刺激，我成了班上最用功的学生，尽管这一年因父亲到远离家乡的新野工作，我和母亲也随着东奔西走，生活处于一种极不安定的情境中，但是我的学习并没有因此受到大的影响。到五年级结束的时候，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间，我就报考当时准备迁移到内乡县夏馆镇的开封初中，当时只考

到“备取生”而没有被录取，但是对毕业之后考取开封初中的正取生，我已经是信心十足了。

(四) 中学阶段——河南省开封初级中学和开封高级中学

1939年初，因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和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1939年夏天，河南省在开封的大学和主要中学开始向河南省西南部的山区迁移。由于我家所在的内乡县位于伏牛山山区，是个日本人很难到达的地方，因此，当时开封的几所较好的学校，如开封初级中学（简称“开封初中”）、开封高级中学（简称“开封高中”）和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就都迁入了内乡县的夏馆镇。这一年冬天，我正好小学毕业，听说原来在开封的中学搬到了离家较近的夏馆镇，就准备报考开封初中。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在这里度过了我中学的六年生活（其中有大半年是离开这里逃难到陕西的流浪生活）。

1940年春，我12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著名的开封初中，开始了我的三年初中生活。开封初中是当时河南最好的初中之一，有着高水平的教师，如当时讲授代数的武老师、讲授英语的白老师、讲授历史的毛建宇老师等。这所学校还有优异的教学经验和优良的学风，毕业生的升学率是很高的，同学们学习都十分用功。

进入初中后，我努力学习、刻苦用功、热情待人，和同学相处得很好。当时学校同学都参加所谓的“童子军”，一个学校编为一个童子军团，一个年级编为一个大队（营），一个班级编为一个中队（排）。到了二年级，我被选为这个年级的童子军的大队长，三年级开始，我又被选为全校童子军团的总队长，成为全校同学中的佼佼者。每天早晨，我领着全体同学做早操；每个星期一的早晨担任纪念周的主持人。

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初中的旁边就是当时的开封高中，这两所学校相距很近。当时的开封高中，是河南省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个进步势力很强的学校，有党支部组织和领导的许许多多的社团以及由这些社团制作的壁报。由于这些社团都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所以这些壁报的内容都很进步，除了有关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外，多数内容是反映主张抗日、反

对内战的。我们一些初中的同学常到高中的校园里阅读当时各种各样的壁报，这提高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以后的思想倾向有着重要影响。

夏馆镇处于伏牛山中，是当今宝天曼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盆地，是在层峦起伏的重山之中的一个约有两百户人家的小镇。这里的民风极其淳朴，过去同外界的交往较少，百姓们对新来的教师和学生都抱着既好奇又热情的心态。我家住的罗岗村，离夏馆镇有120里。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我都要步行120里，翻过许多大山，才能到达目的地。如果步行一天到学校，就十分疲劳，第二天两腿就僵直得不能走路。因此，上学或放学，经常是步行两天，就是这样，等到学校，也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我都是这样的。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直到现在，我能经常行走而不太感到疲劳，和中学时期的锻炼是很有关系的。我从小就喜欢爬山，小时候，在离家只有5里路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作“土谷山”的小山，我经常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到山上捉蝈蝈。这次来到了我从未见过的大山，更诱发了我爬山的浓厚兴趣。这六年中，几乎每个星期日，我都进行爬山活动。我的学习是认真的，而且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在同学中也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三年间，开始的时候我担任所在班级的干部（童子军的中队长），二年级以后就担任全年级的干部（童子军的大队长），后来到三年级的时候就担任全学校的干部（童子军的总队长）。全校当时共有900多学生，编为1个童子军团，下设3个大队，每个年级为1个大队，每个班级为1个中队。在学校，我喜欢主持正义，常常打抱不平，在同学中有相当高的威信，在我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正直而又用功的同学。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正在进行毕业考试，学校的一些规定限制了同学们的一些正当利益，同学们就群起反对。当时的学校领导说这是我在后面鼓动的，并传出话来要开除我。同学们知道后极力反对，最后校方妥协了，这一件事才算了结。在我1955年写的传记性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1940年考入开封初中后，即在那里整整读了3年书，在这3年中……在校很用功，主持正义，在班中很有威信，被同学选为班长，曾和班中靠拢学校当局的学生闹意见，临近毕业考的时候，反动的学校当局借口我不服从校规而要开除我，结果，

因同学反对，未成。

1943年春季，我仍然以较优的成绩考入了开封高级中学。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系清末河南省大学堂和开封府中学堂沿革而来的，始建于1902年春。1913年河南省高等学堂（1903年，河南省大学堂更名为河南省高等学堂）和开封府中学堂分别更名为河南省立第一中学和河南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两校又分别更名为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开封初级中学。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两校合并为河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1985年春，恢复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校名。到今天，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已经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中，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宝贵的人才。

开封高中，不仅因历史悠久而负有盛名，更以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为人赞誉。1929年，伟大的爱国运动一爆发，她便闻风响应；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就立即汇入这一反帝运动的洪流；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紧要时刻，她率先组织了震动全国的开封“一二·九”卧轨斗争；1947年4月，她发起了古城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开封高中当时在全国都是升学率较高的学校，有十分严谨的学风，学生有认真学习、思想进步、刻苦努力、生活朴素的传统，大多数教师都是河南教育界的名师。从考入大学的比例来看，开封高中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开封高中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为当时大后方一个少有的革命和进步的摇篮。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在学校纠合了一些反动和帮派分子，与进步学生作对。1943年1月1日，借着庆祝元旦，国民党在开封高中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当时共抓去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60余人，整个学校陷入了沉寂。

我是1943年2月入学的，学校校长王云青是一个主张“兼收并蓄”的国民党党员，对当时国民党的大逮捕无能为力，而教务长李子平则积极为反动的国民党效劳，因此，他在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控制，企图把开封高中的进步力量彻底打垮。我们作为一年级的新生，对学校压制学生深感不满，我和班上正直的同学常常与班上靠拢学校当局的学生对立。正由于对学校压制学生的种种措施不满，所以我成了学校的“捣乱分子”。1944年寒假，学校发给我的通知书中说，我因为操行为“丙”等而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当时，学校把学生的操行分为“甲”、“乙”、“丙”、

“丁”4个等级，如果操行是“丁”等，就要受到退学的处分，学校给我“丙”等，尽管没有勒令我退学，但“留校察看”对一个学生来说，已经是够严重的了。今天看来，我在开封高中读书这一段时间，与反动学校当局和反动学生是有过斗争的，但这斗争带着自发的性质。当时，班上有一部分三青团的学生，他们欺压同学，横行霸道，我们对他们的斗争很激烈，因为这些人完全是反动教务长李子平的“走狗”，所以我们称之为“校狗”；班上也有一些进步的学生，如肖怀全、张治国、李鉴、崔万顺、韩国楹等，他们有些是原来学校社会科学读书社的进步同学，都是勤奋努力、用功爱读书的学生，因此受到学校的歧视和压制。其他几个同学和我同样，操行成绩都是“丙”，都受到了反动学校当局留校察看的严重处分。

1945年3月，新学期刚刚开学，日寇就大举进攻河南南阳等地，战火日益迫近内乡县夏馆镇，开封高中不得不再次西迁。这是一次极为仓促的大逃难，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一夜之间，全校500名左右的师生，背上极为简单的行李，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前后大约15天，从河南内乡县的夏馆镇，沿着伏牛山一条峡谷中的崎岖山路，经军马河、米坪镇、朱阳关、五里川、大河面等进入陕西的洛南县，由洛南县向北，过石龙、黄龙庙等地，翻过大秦岭，爬上秦岭之巅。从秦岭而下，最后到达了陕西华阴县。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逃难。我作为一个17岁的中学生，背着20斤左右的行李（被褥、衣物和书籍等），随着大伙儿逃亡。当时的目的地就是西安，学校告诉我们，只要到了西安，找到国民党的教育部门，就会有人安排我们重新读书。想去西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大量的河南商人在那里经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学校希望，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许河南在西安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同乡会伸出援助之手。就这样，全校几百人向西安出发了。

我们同班的几个同学走在一起，没有钱，只好乞讨，一路上，向路旁的村民解释、乞求，说明我们因日寇入侵而不得不向内地逃亡，希望他们能施舍我们一点吃的。讨到了，就吃一顿；讨不到，就只好饿着肚子。走在前面的同学，讨到的可能多一些，后面的，就只能少一些了。一行几百人的流亡学生，沿着同一条山路乞讨，这对那些本来就贫穷的农民来说，